

杨锺贤 郝志达 主编

文白对照全译

史记

第一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杨锺贤 郝志达 主编

文白对照全译史记

第一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前 言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它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但是，由于时间的久远，古今语言的隔膜，今天和将来的一般读者是不大容易读懂了；读不懂，就无从领略其巨大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海峡两岸的一些有识之士都先后注意到了这一关乎祖国文化传承事业中的严峻问题，并陆续出版了多种选注本、选译本、全注本、全译本和全注全译本。这对把《史记》从史学家和《史记》研究工作者的书斋里解放出来，使它成为更广大的读者的共同文化财富，无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然而，不同的读者层对《史记》又有不同的要求，而《史记》研究的成果，不论是宏观方面的还是中、微观方面的，也都越来越丰富，这就需要在总结和借鉴已有《史记》读物出版经验的基础上，再多出几种能够使读者窥知《史记》全貌，并且更便于读者阅读和使用的全注全译本。我们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之约编写这部《文白对照全译〈史记〉》就是对这种想法的一种尝试。

一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大约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或者还晚一些。其卒年迄今无确考，大约是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或者还稍后一些。

司马迁出身于史学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仕于汉武帝建元、元丰之间(前140—前110)，任太史令。司马谈是位学识非常渊博的人，不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谙悉历史，而且对于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各个流派及其学说和主张，也都十分清楚，曾论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之要旨”。这样的家庭，对司马迁自然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司马迁在他的出生地龙门，过了一段耕牧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近下层民众，了解他们的疾苦。他十岁时，便已诵习古文。他曾受教于各种学派的名师，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学术思想。他二十岁开始漫游，饱览过许多名山大川，足迹所至，遍及今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其间，他还在齐、鲁两地(今均属山东)的都会研讨学问，并考察过孔子的遗风，在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探察过禹穴。这段游历生涯，不仅扩大了他的知识视野，丰富了他的见闻，同时也陶冶了他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情感，磨炼了他适应生活的顽强意志。这次游历归来，他出仕为郎中，并奉命出使今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区。这段经历对他了解和认识西南地区的情况，为他后来撰写《西南夷列传》都有很大助益。

元丰元年(前110)，武帝举行自刘汉王朝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封禅典礼，而司马迁的父亲作为太史令却因病滞留周南(今属河南)，不能参与其事，深感失望，病情加重。正在这时，司马迁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的一个地方看望了父亲。司马谈在弥留之际，握着司马迁的手，哭泣着嘱咐他一定要继承父志，光大祖业，写出一部完整的历史书来。司马迁也流着眼泪表示，一定详细认真地编述父亲所整理的史料和旧闻，完成父亲的未竟事业。

元丰三年(前108)，在司马谈薨逝而没的第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开始着手搜集史料。由于他的职务之便，汉兴以来，

“百年之间，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使他得以读到皇家所收藏的典籍，即所谓“明堂石室金匱玉版”之书，所以他掌握的各种史料相当丰富。而他在游历和奉命出使期间的见闻及经心采访得来的材料，自然也是对他所需史料的丰富和补充。武帝太初元年（前104），由他参与修订的《太初历》正式颁布，于是他便根据业已掌握的史料“论次其文”，开始了《史记》的编写工作。

武帝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遭李陵之祸，被处以腐刑。李陵是汉初名将李广的孙子。天汉二年秋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攻打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山，作为偏师的李陵为了牵制匈奴，不使匈奴全力迎战贰师将军的主力部队，便自请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由于孤军深入，李陵所部遭到匈奴的围歼，他虽然“且引且战，连斗八日”，但在匈奴“遮狄绝道”，使其断粮乏食，“而救兵不到”的情况下，终于投降了匈奴。而贰师将军李广利连匈奴军队的身影马迹也没看到，就无功而还了。尽管如此，李陵投降匈奴毕竟是变节行为。而司马迁却借皇上“召问”之机，“推言陵功”。结果触怒了武帝，认为他“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司马迁之所以“推言陵功”，虽然有出于对李陵的同情而为他辩解的因素，但就其初衷来说，是“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即宽慰宽慰皇上，也堵一堵那帮落井下石的“全躯保妻子之臣”的嘴。没想到他的“款款之愚”，“拳拳之忠”，却不被皇上所“深晓”。其实“深晓”也不行，因为司马迁“推言陵功”，就等于对贰师将军李广利不满，对皇上不恭。李广利是武帝宠妃李夫人的长兄，备受武帝恩宠，即使在李氏兄弟都坐奸被诛，他本人伐大宛丧师而还的情况下，还被封为海西侯。汉武帝怎么能容忍司马迁借“推言陵功”而说贰师无能、皇上用人不当呢？然而，“推言陵功”也罢，“沮贰师”、“诬上”也罢，这都不是司马迁被处腐刑的根本原因。根

本原因，还是因为他写的《史记》。司马迁继承发扬了古代良史秉笔直书的精神和传统，“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京杂记》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削而去之。后坐举李陵降匈奴，下迁蚕室。”《三国志·王肃传》云：“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汉书·班彪传》引班彪《史记后传略论》云：“其论学术，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戡守节而贵俗动：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这些载述，把前因后果说得都很清楚，接触到了司马迁横遭腐刑的真正原因。他居然敢于“贬损当世”（班固《典引》引汉章帝语），“极言”先帝之短和“今上”之过，这当然会使武帝窝火；而在学术上，他又“崇黄老而薄五经”，自然也“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格格不入。仅此两端，司马迁遭祸已是势所难免。所谓李陵事件，“沮贰师”云云，那不过是汉武帝惩治他的一个由头而已。

“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遭受宫刑（即腐刑），这对司马迁来说，自是一种奇耻大辱，这不单单是对他肉体的摧残，也是对他精神上的巨大打击。他在给他的朋友任少卿的信《报任安书》中写遭：“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使他含辱忍垢地坚强地活下去呢？他在遭李陵之祸后，曾喟然叹道：“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但他紧接着就退而深思，想到了昔日“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

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也”（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显然，他从众多蒙受不幸却终于有所作为和建树的前人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榜样，找到了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和力量。父亲的遗嘱遗训，也是使他继续生存下去的原因之一。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累继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世也。”他所说的“恨私心有所不尽”云云，就是指他父亲的遗愿和他自己的抱负尚未实现，还没有最后完成他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史记》。但是，如果把问题说到底，他之所以能够忍辱含垢地继续生存下去，是因为他确立了正确的生死观。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吏，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能与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使然。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也。”如果不是他有这样的生死观，在他遭到“最下腐刑极矣”的污辱以后，要“苟活”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使司马迁顽强地活下去并完成《史记》的写作，还有时代对他的呼唤和他对时代的责任感。尽管由于遭受李陵之祸使他对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残酷本性有所认识，并且他对当时政治黑暗的一面也深恶痛绝，但汉兴以来百余年间，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毕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较之它以前的历朝历代毕竟是一个空前伟大的时代，而武帝朝又是大汉帝国日丽中天的时期，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堪称当时世界之最。这样的时代，自然会使命正而又有所抱负的士人受到鼓舞和激励。然而盛极而衰，又是以往历朝历代屡见不鲜的前车旧辙。时代需要人们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便使大汉帝国能够长治久安下去。作为恪守祖业

家训而以志史为己任的太史公司马迁，就把“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看成了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司马迁蒙辱度过一年多的“蚕室”生活，于武帝太始元年(前96)被赦出狱，任中书令。中书令是皇帝身边的秘书，负责掌管文书，起草诏书。若单从所处职位来看，确如班固所云，“尊宠任职”(《汉书·司马迁传》)，其地位并不比太史令低。但是，当时的中书令都由“刑余之人”即受过腐刑或虽非受刑而被阉割过的人担任，所以对司马迁来说，这是一个带有极大屈辱性的职务，而他接受了，目的只有一个，继续写他的《史记》，因为这个职务对他编写《史记》有许多方便条件。武帝征和二年(前91)，他在《报任安书》中，提到了《史记》全书的类别及篇数，与今传《史记》的类别和篇数相同，可见，那时《史记》的撰写工作已基本完成。

至于司马迁到底死于何年，怎么死的，迄今还是一个谜。前引《西京杂记》和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引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在述及他以坐举李陵而“下迁蚕室”以后，都说他“有怨言，下狱死”。还有，汉章帝曾说过这样的话：“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义)士也。”(班固《典引》)这些说法，是不是都有一定的联系呢？如果有，那“微文刺讥，贬损当世”和“有怨言”，是不是指他的《报任安书》呢？不管他因为什么死，也不管他死于何年何处，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死是“重于泰山”的，因为他实践了他的生死观，用生命完成了《史记》这部开启百代的史学杰作，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十分丰富而又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二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在上古时代，“史记”原是史书的泛

称，如《周书》有《史记》篇，《吕氏春秋·察传》谓“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司马迁在他的《太史公书》中也每每有这种指谓，如卷四《周本纪》：“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卷二十七《天官书》：“余观史记，考行事。”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乃因史记作《春秋》。”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迁为太史令，轴史记、石室金匱之书。”至于为什么史书称作“史记”，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诸国皆有史，故曰‘史记’。”那么，是什么时候，在哪一部书里才把司马迁的《太史公书》称为《史记》并以此为专名呢？是唐人编写的《隋书》，其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史”部首条云：“《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以后，虽然仍有称《太史公书》的，但作为规范性的书名还是都称《史记》。

在先秦以前，确如张守节所说，“诸国皆有史”，但真正流传下来的并不多。先秦的历史典籍多出于史官之手。据载，周代的史官还有太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之分（大概这是沿袭殷商旧制而又有所损益）。不唯如是，记言记事还分得很清楚，《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如《春秋》即为记事，《尚书》即为记言。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即从编写体例来看，《史记》以前的史书，有编年史如《春秋》，有按诸侯国分国记言、记事的史书如《国语》、《战国策》，也有以文告等形式保存下来的偏于政治方面的史书如《尚书》。总之，先秦虽然有史，而且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开始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史学传统，但是，通贯上下几千年，兼容各个朝代，囊括各个方面，而又融记言记事记人物为一体的通史，在《史记》问世前却还没有一部。

史有六家，统归二体，这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在其史学名著《史通》中提出来的。所谓二体，就是“编年体”和“纪传体”。《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创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清代赵翼

在其《廿二史劄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这话基本上切中了《史记》的体例实际和它对后世作史者的深远影响。你看，汉代另一位史学巨子班固，他虽然对司马迁不无微词，对《史记》也有所批评，但他最早承袭了《史记》的编次体例，他的《汉书》就是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以后一直到《明史》乃至《清史稿》，虽然名目偶有改变，类别或有差异，具体的编次方法也不尽一致，但却无一例外地都有“纪”有“传”，这正继承了《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传统。南宋史学家郑樵在其《通志·序》中说《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这话诚为确评。

据《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全书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共计一百三十篇，凡五十二万余字，与今传《史记》同。《史记》的这五种体例，各有侧重、各有所用和所宜，上引赵翼说，那是高度概括的说法。如果稍稍具体地说，十二本纪除《秦本纪》，其他各纪，都是叙述历代帝王的政绩的。项羽虽然未能最后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但他在灭秦的过程中和秦亡以后的楚汉之争中毕竟曾威震一时，并“王诸将相”，而“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故有《项羽本纪》。至于有《秦本纪》，盖因秦始皇与原秦国的世系一脉相承，而他本人就是由原秦王而为秦帝的，所以秦国自不同于春秋战国以来的其他诸侯国，为它立纪也就理所当然了。“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纪，对全书叙事起联络和互补作用。“书”是分类载述有关史事始末的文献，分别记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和艺术等方面的沿革、发展及现状，近似现代的专门科学史。“世家”主要载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其中陈涉虽非贵族侯王，但“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所以把他的事迹也写

在“世家”里(这突出地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列传”，绝大部分篇什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也有少数篇什如《朝鲜列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则是载述国外有关民族和国内少数民族政权及其与刘汉王朝关系的历史。

《史记》通过上述五种体例和这五种体例之间的互相配合与相互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庞大体系，全面而系统地记述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朝，这三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历史。它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杰作，是我国自先秦各代直到汉武帝朝这上下三千多年历史的伟大总结，是中华史学的一个划时代标志，也是司马迁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极其宝贵的贡献，并以此使司马迁进入了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

三

正如本前言一开始所谈到的，《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它不仅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的传统，同时也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传统。这也是古今学者和广大读者“不能舍其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史记》的文学价值、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人物传记里。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数以百计的不同阶层和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深刻的洞察能力、卓越的认识能力和高度的概括能力，而且通过这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形象地、具体地、质感化地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对被奴役的下层民众的重视和同情，以及为被欺侮、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斗争热情。

《史记》作为传记文学，其思想内容是相当丰富而深刻的。这

首先表现在它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刘汉王朝统治集团及最高统治者的揭露与讽刺上。你看，作者对汉高祖刘邦，虽然也写了他作为刘汉王朝开国之君的历史作用和其志不小，善于用人的一面，可又通过许多史实和细节刻画出他那虚伪无赖、贪财好色、老奸巨滑甚至迹近流氓的丑恶品质。对于“今上”汉武帝，由于其本纪被他“怒而削去”，难以知道作者如何直接描写他的精神风貌，但他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以及他的整个暴力统治，却可以通过有关史实和有关传记人物的活动看出来。如作者写《大宛列传》等，并非单单记述国外有关民族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及其与刘汉王朝中央政权的关系，分明还另有深意存焉。凡是读过《大宛列传》的人都会感受到汉武帝那种强烈的物质占有欲和扩张野心。又如写循吏，没有一位是汉代人；而写酷吏，却又无一例外的都是汉代人，而且除了汉景帝时的邳都外，其他九人都在武帝朝。这也有深意存焉，把话说透了，就是以古代的贤良官吏来衬武帝所豢养重用的这帮酷吏的阴狠残酷，并进而达到揭露批判武帝暴力统治的目的。《史记》还写了各个历史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尖锐复杂的矛盾和争权夺势的政治斗争，那些惊心动魄的血淋淋的历史事实，有力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残酷本质。

《史记》在揭露讽刺统治阶级、统治集团残暴面目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民大众的力量和他们的反抗斗争精神。陈涉是出身佣工的戍卒，由于他不能忍受秦王朝的残暴统治，揭竿而起，率领戍卒造反了！不唯如是，他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张楚。虽然起事不久，他就被叛徒杀害了，但反抗暴秦的第一面旗帜毕竟是由他树起的，那势若燎原的反秦怒火毕竟是由他点燃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声震千古的呼唤和呐喊，毕竟是从他口中喊出来的；而且，他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卒亡秦族”，毕竟“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司马迁从他所领导的反秦起义事业中，在一

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的伟力，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当时正在盛行并已被最高统治者汉武帝所确认的“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封建正统思想，勇敢地写下了《陈涉世家》，记述了陈涉首难反秦的全过程，肯定和歌颂了陈涉及其所领导的反秦起义在推翻暴秦统治的历史大事变中所起的作用。在《酷吏列传》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人民群众反抗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的必然性及合理性。

《史记》还写了许多足以令后人景而仰之的爱国志士和爱国英雄，写了为正统史家和官修史书所不屑于写的下层人物，并对他们的侠行义举和高尚品德，给予了一定的评价。

《史记》作为传记文学，它的思想内容是相当丰富而深刻的，远不止我们所举述的这几个方面。它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位、不同的侧面，鞭笞了凶残和丑恶，歌颂了正义和善美，在很多方面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和他们的反抗斗争精神。而它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性，固然首先取决于作者思想的博大深邃，但也跟作者善于选材、精于构思、巧于创造性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密不可分，这就不能不谈到它的艺术性。

《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当然要尊重历史事实，所以早在汉代的刘向、扬雄和班彪、班固父子以及后来的许多史学家都称它为“实录”。然而，作者并不滞于历史事实而沾沾于“实录”，而是在忠于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在“实录”的基础上，通过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艺术地再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乃至整个精神风貌，来反映历史的生活画面，表现历史的本质真实。这样，作者笔下的人物，既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又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我们从《史记》中所看到的不是木乃伊，也不是寺院庙宇里的泥塑像和壁画像，面是有血有肉、有灵有感，活生生地跃动在各自“历史舞台”上的人物形象。可以说这是《史记》作为传记文学最突出的特点。而这种特点的形成，除了跟作者的审美理想、审美追

求、审美情趣有关，而且还得力于多种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如情节描写、细节描写、环境描写、场面描写、心理描写、音容相貌描写、直接语言描写、夸张描写等等。而这两种表现手法如何加以立体化的综合运用，又由一以贯之的传旨所统摄，一切都服从于传旨，一切又都体现传旨，服务于传旨。

《史记》作为传记文学，另一个突出特点和成就，是它的强烈的抒情性。古今中外的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都很强调文学的感情力量。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明代学者焦竑说：“诗非他，人之性灵所寄也。苟其感不至，则情不深；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垂世而行远。”（《雅娱阁集序》）郭沫若说：“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论诗札记》）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狄德罗说：“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能打动人心。”（《论戏剧艺术》）他们谈的都是诗和戏剧，其实任何文学作品，都应该有“感情这个品质”，尽管按文学的分类有所谓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之分。《史记》作为传记文学是属于叙事文学的，可它偏有强烈的抒情性，不然，鲁迅先生为什么称它为“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呢？二十四史没有哪一史能跟《史记》相比，不能比的原因很多，如果单从抒情性这个角度来说，除《汉书》还能稍稍仿佛一二，其余各史，都不能望其项背，因为《史记》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部抒情性历史著作。明代茅坤在他的《史记钞》中曾这样说过：“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茅坤是从他的审美立场出发来谈他的审美感受的，我们未必与他同感。但是，我们却可以由此看出《史记》纪传体诸篇的感人力量。那么，《史记》何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感人力量呢？当然和传记故事的内容、情节、手法诸方面的因素有关，但最重要的是作者首先注入了自己的感情，他是怀着强烈

的爱憎来写他笔下的人物的。而这种强烈的爱憎，主要来自他对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清醒认识和正确判断，当然，也与他的身世之感有很大关系，凡读过《李将军列传》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一点。

《史记》作为传记文学，在语言艺术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读《史记》，无论是作者的叙述语言即间接语言，还是人物语言(包括心理独白)即直接语言，都会有一种美不胜收的感觉。即如人物语言，一人有一人的音容声口，一人有一人的表达方式，都各具情貌，几乎都是个性化的语言。至若作者的叙述语言的典雅而不古奥，精炼而不晦涩，晓畅而不浮薄，自然而不浅俗，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却又不露惨淡经营的痕迹，这也是读过《史记》的人的普遍感觉。《史记》实在是一座语言宝库，它的许多语词直到今天还令人口齿生香，还有极强的生命力。这种语言成就的由来，又取决于作者工于锤炼，无论是古人的书面语言还是当时的口语，一经作者之手就变成具有上述情貌的文学语言。

《史记》作为传记文学，它的成就，远不止以上所谈到的这些，但即使就是这些，也足以使它流传千占了。它不光影响到后世的传记散文，而且还影响到戏剧和小说，甚至可以这么说，无论是从事何种文学体裁创作的作家，他都能从《史记》中吸取到有益的艺术营养。

我们当然应该看到，司马迁毕竟是一位封建地主阶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对封建统治阶级残暴统治的揭露和对劳动人民反抗精神的肯定，总地说来，还是为使封建统治长治久安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个总目的服务的。但是，他的《史记》，其史学成就和文学成就毕竟达到了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最高峰，正如鲁迅先生所评价的那样，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况且，他为我们留下的这份丰厚的精神遗产，早已超越了时空的界域，已成为整个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为全世界所共享。

四

尽管《史记》取得了那么伟大的成就，并以此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座丰碑，但它的命运却与它的作者司马迁一样，也是多灾多难的。

早在汉代，《史记》就已非完璧了。据《汉书·司马迁传》载，班固看到的《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至于到底缺失哪十篇，怎么缺失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缺失的，班固并未述及。据《太史公自序》说，《史记》完成以后是“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的，怎么会缺失了呢？这是一个谜。不过，如果同前引《西京杂记》、《三国志·王肃传》以及与班固同时的卫宏《汉书旧仪注》所云武帝见景帝纪及己纪“怒而削去之”的话联系起来分析，很可能汉武帝是造成《史记》缺失的始作俑者。到东汉以后，《史记》又遭到一次浩劫。据《后汉书·杨终传》载，杨终曾“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经此浩劫，《史记》一书残缺到什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所幸，到了东汉时代，《史记》已从皇家图书馆“解放”出来，开始传布到一些上层人物手中，不致逐一加以删削。

有删削和缺失，也就有缀补。最早补《史记》的是汉元帝和汉成帝之间的博士褚先生。但是，他到底补了哪些篇，却众说纷纭。《汉书》颜师古注在前引《汉书》“缺十篇，有录无书”句下引三国魏·张晏注说：“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太史公自序》没提到有《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斯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张晏何所据而云然，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话即使不是子虚乌有，也未必句句可信。今传《史记》凡褚先生所补，一般都明确标示“褚先生曰”，而张晏认为是褚先生补作的《武帝纪》却偏偏没有标明“褚先生曰”，而且全篇是从卷二十八

《封禅书》里截录出来的，作为以喜欢《史记》而补《史记》之缺的褚少孙先生，何至于干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蠢事呢？另外，张晏只说《武帝纪》诸什是褚先生所补，其他篇呢？又语焉不详。到了唐代，司马贞在其《史记索隐》里引述张晏这段话以后，加了一个按语，说“《景纪》取班书（按：指《汉书》）补之，《武纪》专取《封禅书》，《礼书》取荀卿《礼论》，《乐》取《礼·乐记》；《兵书》亡，不补，略述律而言兵，遂分历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辑此篇，何率略且重，非当也；《日者》不能记诸国之同异，而论司马季主；《龟策》直太卜所得占龟兆杂说，而无笔削之功，何芜鄙也”。这就是说，司马贞认为今传《史记》中这十篇文章都是褚先生所补。南宋吕谦则不同意张晏、司马贞的说法，认为除了《武帝纪》确已亡佚，其余诸什俱在，不能以其晚出，就认为是他人所补（见《东莱吕太史别集》）。清代王鸣盛也持这种看法，说“世言褚先生补《史记》，其实《史记》唯亡《武纪》一篇，余间有缺，无全亡者，而褚所补，亦唯《武纪》，其余特附益各篇中，如赘疣耳”（《十七史商榷》）。今天的《史记》研究者多采吕、王说，如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在排印款式上就基本上体现了吕、王二氏的看法，凡认为是后人补写的文字，其较长者都另提行低两字排，标示有“褚先生曰”的文字也这样处理，唯《武帝本纪》没有这样处理。综上所述，今传《史记》确有不少褚少孙补写的文字，至于是否有全篇补写者，一直存在着仁智之见。清代钱大昕在其《廿二史考异》中说：“少孙补史皆取史公所缺，意虽浅近，词无雷同，未有移甲当乙者。或晋以后，少孙补篇亦亡，乡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数耳。”钱氏此说虽然也是推度之辞，但细味之，倒也合于情理，绝非滑头之论。对于褚少孙补写的文字，也有不同的评价，前人多认为“言辞鄙陋”，是“狗尾续貂”。这种评价既失于片面，也很不公平，我们不能以其有些文字粗疏就完全否定它。以其补写文字今传《史记》固在，本书原文部分录有其补写文字，读者自可观玩，所